



上课

邓湘源

人们常说，社会是一所大学校，工作岗位是个大课堂。对此，我深信不疑。因为，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不断学习，不断上课，其中有四堂课让我刻骨铭心。

1977年我参加高考，仅以3分之差名落孙山。次年，镇上招工，我参加了工作，担任湘南地区一家基层供销社收购门市部收购员，是“集体工”。工作之余，我读书无厌，笔耕不倦，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歌、随笔、报告文学、文学评论、新闻报道等什么都写，写了就向报刊投稿，还真是发表了不少东西。到1984年初，我共发表各类文章3000余篇，计200多万字，先后加入了县、市作家协会。

1984年3月，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向社会公开招聘文秘人员，我闻讯赶去报名。没想到，工作人员在翻阅了我的4本厚厚的作品剪贴集之后，摇了摇头，给我一声长叹：要是您有大学文凭的话，那该多好啊！

没文凭就不能当文秘人员？就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？我不服！于是，我给《工人日报》写了封信，信中倾诉了自己的苦恼。不久，信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，加了编者按，并就“要文凭，还是要作品？”的问题，在全国读者中展开讨论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“思想地震”。

受其影响，这年10月的一天，县供销社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、主任风尘仆仆，驱车100多公里，来到我上班的柜台，只丢给我两句话：我看文凭但更看本事，你跟我到县机关上班吧！县供销社主任“看文凭但不唯文凭”的果敢行动，给我上了生动的第一课——改革课。

1995年3月，南岳区面向全省公开招聘国家公务员（文秘），名额只有6人，报考者却达518人。抱着“试一试”的心理，我也报了名。其实，当时我刚刚被向往已久的一家中央机关仅仅以“没有北京户口”为由而拒之门外。

求职中的挫折，不免让我心灰意冷。考试那天，看着考场横幅上写着的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公道”10个大字，我心想，自己一无背景，二无“后台”，三不愿送钱送礼，参加的考试肯定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海选。可是，经过一次笔试、两次面试和体检、考察考核后，我竟然被录取了！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，主考官的话化解了我心中的疑云：考试是特别公正的，你是特别优秀的，所以

你被录取了。被录取的事实，给我上了第二课——公正课。

2004年以来，承蒙各级领导、专家的关心、培养和厚爱，我担任了中央（国家）、省、市机关招考领导干部、公务员面试主考官，并先后担任了亚星杯、富春杯、横店影视城杯、中山杯、晶晶杯、红星杯、靖江杯等9届全国演讲大赛预、决赛评委。每一次，面对形形色色的考生、选手送钱、送礼甚至送色时，我都能做到毫不动心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！这样做，我不是想标榜自己多么高尚，也不想证明自己多么伟大，只是想到自己是船工家庭出身，完全是靠党和人民的培养才一路走到今天，很不容易。所以，我一定要像当年的考官用公正的尺子改变我的命运一样，也用公正的良心丈量手中神圣的权力，让那些素质高、能力强、本事大，没有任何关系的工人、农民、普通劳动者的孩子脱颖而出，走上党和国家重要岗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能赢得党和人民的充分信任，才能坚守“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”的气节，才能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清贫，扛得住诱惑，经得起考验，才能让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寒门难以出贵子”的神话不攻自破。这是面试主考官、全国演讲大赛评委这两个岗位给我上的生动的第三堂课——廉洁课。

王桂发，是我们衡阳日报社原群众工作部主任。2005年初，他被诊断为癌症中晚期，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但是，为了工作，他收好诊断书，第二天就抱起案卷上了法庭，为衡阳日报社的一桩官司做无错辩护。开庭那天，6个小时的庭审，只见瘦弱的他一手按压着腹部，一手做法庭辩论的手势、动作，钻心的疼痛使他汗如雨下，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……辩护成功了！他却倒下了，被人迅速送往医院抢救。虽然当时活过来了，但医生再三叮嘱老王：一定要住院治疗，配合医生做手术。可是，没住几天院，老王一想到自己的工作，就再也坐不住了！在生命最后的三年里，他是一边工作，一边坚持治疗，从未耽误过事情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……去世时，年仅55岁！这是我的同事给我上的第四堂课——奉献课。

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”我深深知道，改革开放的道路还很漫长，我还有许多课要上，但是我想，有改革课、公正课、廉洁课、奉献课这四堂课为我垫底，什么样的课我全能对付！

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事件

甘建华

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回忆说，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，他在北大当学生时，第一次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蔡元培先生。甫一进去，就感觉到蔡先生有一种“光风霁月”的气象，而且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。这就说明，一个人的“气象”，别的人是可以感觉得到的。我初见洛夫先生时，的确也有这个感觉。在我现今的印象中，洛夫先生有王者气象，他是诗歌的帝王，文学的帝王，谁都无法与之相比。

洛夫先生3月19日病歿后，大约有十来天时间，我一直处于恍恍惚惚之中。说是没有精神也不对，能吃能睡，正常读书写作，却又总是感觉有一件什么事情没有做，总是感觉先生在暗中提醒我却又未曾点明。

这就熬到了3月29日晚上，坐在电脑跟前，无缘无故地敲打出“先生问”几个字——啊？这不正是我连日来起意写一首纪念先生的诗歌吗？于是顺着思维，一路溜溜地写下去：“燕子山今春的花事如何／对门岭上的油菜花旺不旺／我家房前那株年柑子／结的果多不多／听说去年秋冬的雨水少／果子是不是有点苦／那树柚子呢 橙子呢……”诗中写到的花与果，的确是几天前在洛夫旧居前举行追思会时，亲眼看到的各种事物。其时油菜花开得甚好，漫山遍野，金黄灿烂，让人的心里无端地柔软。那株结满果子却无人采摘的树，我不知道名字，请教了好几个乡亲才知道俗名，至于学名却没有一个说得出来。

写完《先生问》，思绪还在激情飘扬中，突然想到那年在雁城宾馆，先生与我两人叙谈的情景。他先是问及我的年龄，回答1963年8月，他突然呵呵呵地笑了起来。我莫明其妙，傻愣愣地看着他。这是我见他笑得最酣畅的一次，往常他虽然也笑，但都是有所节制，适可而止，因为他平时给人的印象，有一种天生的不怒自威。待笑够了，他才缓缓地告诉我，正是那年那月，他在台北宜兰县平溪乡，与诗友症弦、商禽、辛郁、楚戈，还有正在台湾师范大学念博士的韩国诗人许世旭，在一个深谷涧水裸泳并摄影留念。

先生说，那天正是我的女儿莫非的周岁生日，他们是应我们的邀请前来庆贺。除了我以外，他们都还没有结婚，甚至都还没有女朋友。几条大汉就像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说的那样：“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”旁边的厨房里，我妻和一位姓游的漂亮小姐在忙活着。喝完酒，吃过饭，大家商议去爬山。但游小姐告诉我们，附近山谷中有一口深潭，水色澄碧，人迹罕至，可以游泳。大家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精力旺盛得不得了，全部接受游小姐的建议——游泳去！走了半个多小时，一看的确是常人不到之处，不但风景殊佳，而且蝉鸣声让山谷显得格外幽静。可问题也随之而来，我们都没有带游泳裤，如何是好？这时候，只听商禽一声吆喝：“这样的荒田野地，要什么游泳裤？脱吧！”然后第一个脱得精光，跳进了深潭之中。我们也一个个效法，成了浪里白条，只有不会水的辛郁在浅水处游玩。游累了，我们都躺在沙滩上晒太阳，许世旭拿出相机来拍照。开始大家面面相觑，集体裸泳就已经惊世骇俗了，如果再拍裸体照，那不成了花花公子吗？但是既然裸泳了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国外不也有天体浴场吗？我们只能算是在台湾这个小岛上，做第一个吃螃蟹者吧？拍第一张照片时，症弦还摘了一片水姜花叶子将私处遮盖，第二张大家根本无所顾忌，一个个抬头挺胸，在镜头下毫无羞涩地摆出各种姿势，显示男子汉大丈夫的体魄，只是每个人都将双腿夹得紧紧的——毕竟还是中国人嘛！

“这都是我们年轻时的荒唐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只是觉得洒脱得有趣，洒脱得近乎胡闹。”先生说完这番话，有人敲门，来客了，我们的交谈戛然而止。

时隔多年，我在晴好居回忆这桩趣事，边笑边轻松地照录下先生的语气，完成了《先生说》这首诗，与前面的《先生问》组合在一起，便成了《先生问与说》。中诗网翌日推出，新湖南客户端接踵而上，又有新浪微博、今日头条的支持，浏览量很快过了10万+，用一句“好评如潮”不算过分吧？

5月初，有朋友建议将这两首诗请人朗诵，可能更加好玩。我立即想到了曾在青海油田电视台工作时的同事、金牌播音员何曦霞。5月11日，中诗网音讯频道上传后，半个小时即过5000浏览量，接着人气刷刷地往上飙升。

又过几天，晚上闲来无事，翻读洛夫先生散文集《大河的潜流》，见目录有《裸泳记》，赶紧找到这一篇——我的天！他们当年在台北平溪裸泳那天，正是1963年8月18日中午，而那一天那一刻，不刚好就是我出生的时辰么？怎么会这么巧呢？记得他当初给我说这件事时，并没有问及我的生辰具体日期。“那是一九六三年八月／我们在千里之外的台岛／开着所谓的风气／或者说敢为人所不敢为／你在家乡湖南衡阳／一个名叫茅洞桥的镇上／呵呵呵 发出了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……”请注意我最初写诗时的胡诌，居然与民间习称的八字神奇地对应上了，尤其是“婴儿的第一声啼哭”，简直就是金口预言啊！如果在这之前知道是十八日，我一定会写进去的。难道历史真的有这样的机缘巧合？这恐怕是我与洛夫先生都没有想到的。看来以后不能乱说话了！冥冥之中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。

我将这事发到微友圈，大家都感到的确不可思议，从各个角度进行论述，给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考。何曦霞是前述事件的亲历者，说：“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，更应视为你与洛夫先生有一种割不断的情缘，或者说你们俩有某种心灵感应、心气相通吧。”她建议将“十八日”三个字加上，重新录制一遍，但我想了想，还是保留这个缺憾吧。